

湖南抗战精神的建构与诠释¹

李 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湖南社会各界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相持阶段，国共合作，军民协同，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湖南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积极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构建和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攻坚克难、血战到底、精诚合作、坚忍不拔的湖南抗战精神。湖南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对激发人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湖南；抗战精神；构建；诠释

抗日战争期间，湖南战场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九一八事变”后，湖南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战争相持阶段，国共合作，军民协同，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湖南人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积极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广大军民在顽强抗击日军的过程中，构建和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攻坚克难、血战到底、精诚合作、坚忍不拔的湖南抗战精神，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伟大的抗战精神，他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②在新时代梳理湖南抗战精神，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湖南抗战精神，对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众志成城、同仇敌汽：社会各阶层共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积极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既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也有广大三湘儿女和外籍爱国人士的重要贡献。正如《香港星岛日报》在对湖南抗战的报道中所指出的：“抗战所以能够一天比一天接近胜利，固由于前方将士的流血致命和后方民众的出钱出力，但各党派、各阶层的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力的因素。”^①

（一）社会各界构筑起抗日救亡精神文化城

“九一八事变”后，湖南社会团体掀起抗日救亡高潮，积极发起建立抗日救亡组织，以实际行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仅在长沙一地就有 35 个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有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国记者协会长沙分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②。这些社会团体是抗日救亡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省城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反日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各单位、学校、剧场、影院以至村落农舍，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向群众宣

¹【作者简介】：李斌，女，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抗战精神对当代湖南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6JCWB014）。

²①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 页。

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野心，唤起民族的觉醒。抗日救亡宣传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军营，渗透社会各阶层，提高了民众抗日觉悟，为全民抗战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广泛动员，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全国文化界人士汇聚长沙，掀起文化抗日救亡运动，自觉地“把文化工作与抗日救国结合起来”，使文化服务于抗战，激发了湖南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各界文化人士把自己看成是抗日救国力量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未有的现象”^④。淞沪会战发生后，各地文化教育机关纷纷迁入湖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临时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杭州艺专、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央日报社、国际新闻社、东方杂志社等陆续迁到湖南。一大批文化名人、学者如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胡愈之、张奚若、吕振羽、翦伯赞、范长江、谭丕模、曹禺、田汉、阳翰笙等约 700 余人云集长沙。他们“不作战时古城的难民过客，而是抗日烽火的文化传人”^⑤，明确提出“全民众的精神武装和物质的武装同等重要”，主张实施“文化总动员”，“用集体的力量去担荷民族抗战的文化任务”^⑥。这些文化名人与湖南文化界汇合，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在湖南办学校、书店，编辑出版报刊，举行演讲、巡回宣传、戏剧演出等活动，进行文化抗战总动员，在三湘大地播下爱国救亡的种子。因此，当时的长沙被称为抗战“文化城”。

（二）中国共产党凝聚各界“团结御敌”精神

中国共产党对湖南抗战起了重要的发动和推动作用，极大地鼓舞了社会各界、各阶层、各阶级“团结御敌”的抗战精神。一是在抗战救亡团体中发挥中坚作用。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均以团结、爱国、抗日为宗旨，大多数建立了党支部，或是共产党员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使长沙成为当时全国抗日文化的中转基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传播中心。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是当时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领导下的一个最大的全省性抗日救亡团体，该会成员发展到 1000 多人。1937 年 7 月 9 日，长沙各报用大字标题报道了日军进犯卢沟桥和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动员湖南民先队队员和救国会成员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号召“国人迅速抵御外侮”，动员组织工人、学生、店员、妇女、文化界和机关职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抗战^⑦。1938 年 11 月 12 日，长沙各界文化团体在长沙师范学校举行孙中山诞辰 72 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⑧。周恩来、叶剑英在长沙的多次讲话，鼓舞了湖南人民团结御敌的勇气，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二是在新闻出版界宣传抗日救亡主张。长沙会战前，湖南新闻报刊杂志、图书出版发行业日臻繁荣。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在长沙创办《反日专刊》《抗日特刊》《抗日》《抗日救国》《抗战日报》《观察日报》《中苏》《抗战文化》《前进》等 40 多种报刊^⑨。这些刊物发表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散文、诗歌、小说、通讯、报告文学作品，激发人民的抗战斗志。长沙的书店、出版社等由原来的 60 多家发展到 125 家，影响较大的有战时书报发行所湖南分所、生活书店湖南分店、大众书店、三出版社、中华书局等，这些书店和出版社发行《抗战小丛书》《中苏小丛书》《经济丛书》《农民抗战小丛书》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抗战论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三）湖南地方政府发动民众“毁家纾难”，共赴国难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湖南地方政府开展了系列动员群众支持抗战的活动，激发了湖南民众“毁家纾难”的抗战精神和决心。湖南省党政当局，于 1937 年 7 月 18 日邀集省民众教育馆、省农民教育馆、省人民提倡国货救国会、省民众常识指导

^③①《相持阶段中的任务》，《香港星岛日报》1939 年 10 月 13 日。

^②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40 页。

^③长沙市妇女联合会编：《长沙巾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沙妇女运动史料选编》，1990 年发行（内部资料），第 223 页。

^④陈润泉：《抗战一年来的中国文化》，《中苏》半月刊第 1 卷 9、10 期合刊，第 15 页。

^⑤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载《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1 页。

^⑥《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缘起》，湖南《大公报》1937 年 10 月 10 日。

会、省会民众国术俱乐部、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和市政府等单位成立长沙市人民抗敌后援会。24 日，长沙市人民抗敌后援会扩大为湖南省人民抗敌后援会，并宣布“本会以统一湖南人民意志，集中力量在党政上级机关指导下，努力抗战工作”，提出“抱定决心长期抗战，团结精神严守纪律，镇定沉着安定后方，肃清汉奸以消隐患，捐款劳军毁家纾难”等作为该会的宗旨^①。湖南省政府在长沙举办两期民训干部训练班，学员结业后，被派往各地组织训练民众。半年之内，在乡村训练了 70 多万民众。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任作民说：“张治中开办干部训练班，训练后派往各县工作，把革命的种子都撒播到各县去了。”^②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湖南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各种实际行动迅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二、自立自强、无私奉献：全民共筑攻坚克难的抗日精神

抗战时期，面对强敌入侵，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广大湖南人民发扬自立自强、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从事生产建设，自愿节衣缩食，参与各种经济物质支援抗战活动，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一）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展示奋发图强的湖南抗战精神

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是坚持抗战的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在“提倡国货、发展实业”的刺激下，湖南兴建了一批近代工矿企业。1932 年至 1936 年，先后创办了国货陈列馆、湖南机械厂、湖南工业试验所、湖南铋业联合贸易处、湖南造纸厂、湖南炼锌厂、郴州协康铅磺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酒精厂、桃源冷家溪金矿等数十家企业。此外，还有一大批抗战初期从沿海、沿江地区转移到湖南的工矿企业和科技文化人才。在兴建、搬迁工矿企业的艰难历程中，湖南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体现自强救国的湖南抗战精神

随着抗日救亡宣传的开展，湖南人民开展了深入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国货运动。抗战时期，抵制仇货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抵制仇货、断绝供给，是对日经济绝交的具体措施，直接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抵制日货的同时，湖南人民发起了国货运动，主张“提倡国货、发展实业”，使湖南实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支持了抗战。“九一八事变”后，长沙各界反日情绪高涨，严厉查处“仇货”，积极开展国货运动，因为“提倡国货是扶危救亡的唯一出路”，“提倡国货是雪耻复仇的根本要图”，“提倡国货可以发扬民族精神”，“提倡国货可以恢复民族固有美德”。1932 年 10 月 1 日，国货陈列馆开业，何键在开幕式演讲中指出，要救贫救国，不但要发展国际贸易，而且要提倡国货，而“提倡国货为最应注意者”^③。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各界掀起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体现了湖南人民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抗日决心。

（三）积极捐钱捐物，体现无私奉献的湖南抗战精神

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湖南人民积极开展各种募捐活动。1933 年 2 月 16 日，由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起，省会各界成立了湖南航空救国会，推教育界名流胡庶华等人为委员，积极“筹款购机救国”。为支持长沙邮政员工集资购置“邮工号”飞机，各县、市商会纷纷成立捐资机构，“募捐购机”^④。“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共各级组织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人们积极献金献物，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 年 7 月 7 日，长沙各抗日救亡团体和各界民众在教育会坪举行纪念抗

^①范忠程：《湖南抗战论述》，《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②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湖南》，2004 年编印，第 386 页。

^③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40 页。

^④《长沙文化城——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7-458 页。

^⑤湖南省档案馆编：《抗战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5 页。

战一周年大会，张治中到会讲话，倡议在全省开展抗战一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动员群众献粮、献金、献物。献金运动的第一天，就收到募捐款 96087 元^⑤。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积极为湖南抗日战场捐款的，有全国寒衣总会、全国慰劳总会；有各地祝

捷大会，如广东、贵州各界祝捷大会、浙江宁波国庆纪念大会；有各抗敌总会如福建抗敌后援会、浙赣铁路抗敌后援会各、武同抗敌后援会；有学校如国立师范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大埔县立第一中学、明德中学、周南女子中学、明宪女子中学、大麓中学、精炼职业学校、长郡中学、建德小学、蓝田镇立高级小学，等等^⑥。湖南抗日战场得到省内外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体现了湖南抗战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在抗日救亡潮流的激励下，湖南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积极兴办工矿企业、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献金献物，使湖南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也为湖南战场持久抗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军民协同、不畏强暴：共筑血战到底的抗战精神

湖南战场的军民充分发扬湘军“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战”优良作风，军民协同、忠勇用命、不畏强暴，与日军血战到底。1938 年至 1941 年，一批批记者在湘北战场采访，亲历各种生动感人的抗战场面，见到许多浴血奋战的士兵和不畏牺牲的普通百姓，他们感叹说，湘北战场上“士兵之忠勇用命，壮烈牺牲，老百姓之协同合作，实为历次战争所仅见”^⑦。这是对湖南抗战军民不畏强暴、誓死抗敌精神的充分肯定。

（一）民众积极参军抗敌，奔赴前线，体现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

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人民以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掀起奔赴抗战前线的热潮。1937 年 8 月至 10 月，先后有 10 余批，1700 人奔赴淞沪战场支援抗战^⑧。1938 年 4 月 16 日至 22 日，长沙各抗日救亡团体协助省政府举行全省兵役宣传周活动，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参军参战义不容辞。经过广泛动员，长沙城乡广大青年，特别是各校学生纷纷报名应征，要求奔赴延安和参加新四军、八路军。仅长沙县参军赴抗日前线的热血青年就有 6523 人^⑨。各地将年满 18 岁至 45 岁的男子组织起来，编成抗日自卫团，普遍开展军训，并于 1939 年 12 月和 1940 年 1 月先后建立志愿兵营和国民兵团，为支援前线抗战准备了可靠的兵源。同时，湖南工人、学生、妇女、教师、职员、退伍军人，自动组织敢死队、义勇队、汽车队、战地服务团和慰劳队，奔赴抗日前线。参军参战是全民抗战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战必胜的重要条件。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敌我双方都竭尽全力激战。在这种情况下，弹药及物资补给非常重要。在民众的帮助下，第九战区兵站人员组织民众，冲破敌人的封锁、冒着敌人的炮火，排除万难，设法将补给送到前线。有战地记者指出：“三次长沙会战全期，粮弹运输补给的数量，为数不下百万担，在这交通彻底破坏后的湘北，运输工具落伍的中国，人力减少缺乏的战时，要想完成这一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委实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但在我兵站人员的努力苦干之下，除依靠了有限的铁肩队少数输力以外，复陆续发动了十余万湘北有组织的民众，大家起来，共负责任，在流汗出力的军民合作口号下，总算完成了这任务。”^⑩广大湖南民众，正是以各种支援前线的抗敌形式，建构起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敌精神丰碑。

（二）民众自卫武装，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体现不畏强暴的抗战精神

湖南人民发扬大无畏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以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直接支援守军作战。在湖南战场上，先后有 100 万民众

^⑤①湖南省国货陈列馆编查股：《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开幕纪念特刊》，1932 年印行，第 1 页。

^②范忠程：《九一八事变后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求索》1994 年第 1 期。

^③《中国共产党长沙县历史》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5-176 页。

^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 1940 年 6 月发行，第 373-374 页。

^⑤《洞庭静波》（上编），1941 年 10 月编印，第 72 页。

^⑥范忠程：《湖南抗战论述》，《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 4 期。

组织侦察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慰劳队，帮助守军侦察敌情，布雷、毁路、破坏敌人水陆交通，运送军粮、弹药。敌寇侵掠岳阳临湘以后，民众破坏铁道公路，焚毁敌人军库粮栈，剪割敌人的电话线，使敌人辎重部队失去作战优势，物质资源紧张，通讯受阻。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湘北有4万余农民共破坏公路1230余公里。衡阳工人、市民在保卫战中舍生忘死援助守军，“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3174名”^③。抗战后期，湖南民众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有大小数百支，人数近10万^④。我游击队神出鬼没，防不胜防^⑤，敌人提心吊胆，严密戒备。此外，广大老百姓在炮火线上努力从事生产之外，还挺身而出，随时替军队当侦探、送茶饭、抓汉奸，并自愿到游击区带路打击日军，体现了视死如归、不畏强暴的抗战精神。

（三）民众救死扶伤、接济难民，体现舍生取义的抗战精神

湖南民众以舍己为人、不畏强暴的精神及时安抚伤兵、难民，鼓舞了浴血奋战的将士，稳定了战场后方。淞沪抗战后，长沙作为战略大后方，大批负伤的前线官兵和流亡的难民源源不断来到长沙。为帮助难民渡过难关，长沙抗日团体发起救济难民活动。工商界知名爱国人士徐天钧、丁子钦等发起组织“省会各界救济难民协会”，并在长沙城内设立了10个难民收容所、7个难民读书班^⑥。长沙县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为流亡到长沙县农村各地的难民安排住房、粮食等生活用品，动员富户接济难民。长沙会战期间，受伤战士“或是由各部队的担架输送，或是由民众义勇队抬运，到达指定地点，又有人紧接向后输送，所以，在这次会战期间，临近战斗的几个县城，很少看到一个流离失所的负伤同志。”“凡是由湘北战场下来的负伤同志，大部都在衡阳集中，再由衡阳向外转运”^{⑦⑧}。衡阳各车站码头，由各服务团体为负伤同志而设处招待茶水稀饭的，遍地皆是。服务伤兵、救济难民活动的开展，维护了战时社会秩序，激励了抗日将士的杀敌斗志。

三湘七泽，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自1938年冬，湖南直接开始遭受日寇入侵，人民饱受惊险心酸，但湖南人民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正如时人所指出的，湖南战场的抗敌功绩，“除精忠军的忠勇用命外”，民众的踊跃助战，“也同样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荣价值”^⑨。

四、宣传报道、祝捷庆贺：诠释百折不挠、忠勇救国的抗战精神

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念。国内外记者蜂拥至湖南战场，纷纷开展新闻报道、出版书籍、开庆祝会等活动，对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作了广泛的宣传，为建构、诠释湖南抗战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宣传报道，诠释湖南抗战精神

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组织外国记者、武官前往湖南战场及后方参观采访，国内各大小报纸、电台记者云集长沙。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各地报纸作了广泛的宣传。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对长沙会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体现了长沙会战的精神价值。《新华日报》在1940年1月11日的社论中写道：“此次长沙大捷，是有着国际意义的。”^⑩叶剑英指出：“给全国将士以战则必胜的兴奋，给全世界援助中

^①《中国共产党长沙县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②朱振声：《三捷长沙》，长沙忠文书店1942年出版，第40页。

^③衡阳《大华晚报》，1947年8月10日；《衡阳文史资料》第4辑，第26页。

^④《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7页。

^⑤《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10页。

^⑥《中国共产党长沙县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⑦《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61页。

国的友人以满意的答复，给一切反对侵略的人们证明中国军队英勇的作战，是可以把侵略军击退的。”^①国民政府《中央日报》从对内宣传抗战、对外争取舆论支持两方面着手宣传长沙会战，争取最大范围内支持抗战。

《中央日报》对会战进程、劳军活动、物资捐赠、典型人物、日寇暴行等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大力宣传湖南战场军民合作抗敌、不畏牺牲的抗战精神。国内外大量报刊对长沙会战作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对长沙会战精神作了深入的探讨。1939年10月至11月，对长沙会战作了宣传报道的有：《重庆大公报》《香港星岛日报》《湖南国民日报》《香港华侨日报》《香港中国晚报》《香港国民日报》《重庆时事新报》《耒阳国民日报》《衡阳大刚报》《香港工商日报》《香港珠江日报》《茶陵开明日报》《江西前沿日报》《香港星报》《桂林扫荡报》《香港大公报》《香港工商晚报》，等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泰晤士报、塔斯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组织联合阵地记者团，纷纷赴湖南战场采访报道。历经抗战烽火的三湘大地，特别是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坚定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也从多层次诠释了湖南抗战精神。

首先，诠释了“精忠救国”“彻底牺牲”的湖南抗战精神。前线慰劳团于斌在长沙会战慰劳词中指出，“长沙市民是最勇敢，同时也是最光荣的，在三捷长沙里，有着最灿烂的一页历史，全国人士，都心向往之。”这种光荣的获得，完全是湖南精神，尤其是“长沙精神”的发扬光大，即“精忠救国”、“彻底牺牲”精神的发扬光大^②。时人朱岳曾概括长沙三捷的基本精神为：认清了自己战斗的责任、通过了充分的准备、具备了必胜的信念、抱定了必死的决心^③。正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引领着广大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日寇。

其次，宣扬“军民协同”“忠勇用命”的湖南抗战精神。1939年10月26日，薛岳对湖南《国民日报》记者谈话，指出长沙会战致胜的原因，在于“坚韧沉着，快速机敏，军队忠勇用命，民众动作协同”^④。广大军民充分发扬“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在湖南战场各次会战中英勇抗敌，对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湖南抗战的实践证明，湖南人民具有与强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毅决心，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强能力。1939年11月2日，《湖南国民日报》指出，长沙会战密切地关联了民族和国家的光荣，从各种不同的视角里，集中了广大群众的视线。民众面对敌人的奸淫烧杀，更坚强地反抗，没有任何人屈服。“这是抗战精神在战时一度颠扑不破的最有意义的试炼”^⑤。“特别重要的是，使我们以敏锐的注意，来鼓舞我们精神的力量，以摧毁敌寇军事进攻以外的政治的经济的进攻”^⑥。

再次，揭示“更英勇更有力”的抗战文化。日本帝国主义不仅通过血腥的军事战争侵略中国，更在文化方面侵害和破坏我国的文化事业。但在湖南，“我们旧的文化和新的文化却在敌人的炮火中交织着，更英勇更有力地成长起来了，尤其是大捷之后”^⑦。敌人的轰炸，摧毁了部分生命财产，也摧毁了一些散在农村中的文化与教育机关，但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反而激发了人民更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1939年10月19日，《湖南国民日报》刊文指出，三次长沙大捷，“不独影响了湖南的文化，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同时将影响到全世界的文化；这好像是向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颗石子一样，会掀起无数的波纹，波动了全湖的每一个角落。从艰困的奋斗中，才能播下新的种子，创造新的生命；我们有了这次湘北的大会战，才能够在文化上，给一种新的刺激，使文化方面的同志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加努力，更加奋斗，更加密集起来，用一种更新的姿态打击敌人，打击阻隔世界文化进步的一切障碍物，使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更英勇地前进，创造新的收获”^⑧。

（二）发贺电与诗文，赞颂湖南抗战精神

为庆祝长沙会战胜利，全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纷纷发出的贺电如雪片般飞向湖南战场。从中央机关、地方军事机构、行

^①《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41页。

^②《新华日报》，1940年1月11日社论。

^③叶剑英：《论长沙的胜利》，《新华日报》1939年10月7日。

^④《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53页。

^⑤《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1942年6月编印，第477-481页。

^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1940年6月发行，第185页。

政机关、各级党部、参议会，到抗敌团体、教育界、文化界，无不发出贺电。有以全体名义来电祝捷者，有以代表资格称贺者，更有当代名流、各界耆宿祝贺者，函电计达万余件^⑤。蒋介石在接连发出的几封嘉奖慰问电中称赞军民合作，特别是湖南民众的牺牲精神和英勇气概。他指出，湘北大捷：“重创敌寇，一方固由我作战将士，忠勇许国，经验增多，一方尤赖我战地人民，深明大义，志切同仇，协助杀敌，有以致之。迨者中正在湘，迭据各军长官面报，均谓军民合作，得力最大。一般战地民众，无论男女老少，一致随军进退，且皆听从军令，一如士兵；对于破坏交通，运输军实，侦探敌情等工作，莫不奋勇从事，获助至多。其最使人感动者，更有多数壮丁，携其妻女，向后方逃难之际，因见我军，爱护同胞之笃，敌人残杀民众之惨，乃将其眷属，安顿后方，而自身仍亟返赶回本乡协助军队作战，迨至击退敌军，始返后方，寻觅妻孥，略加安置之后，遂即志愿投军。又有若干民众，知其乡里，已为敌所占，乃引导军队，自效前驱，冲入敌阵，拼命杀敌，受伤不退，直至敌溃之后，竟至伤重殒命。凡此奋勇壮烈之事状，尤足以挫敌势，而致伟绩。”^⑥这封电文充分反映了湖南人民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和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湖南战场军民，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对三次长沙会战，许多亲历者或作战场报道，或写会议录，或赋诗文，以表心志。率部参加长沙会战的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作诗五首，描述长沙会战胜利场景及湖南抗战精神。其中有称颂道：“长沙形胜中兴地，犄角平浏鼎足看，天遣风云来四会，阵如鹅鹳拥千官；一言师直歼倭易，三犯旌旗掳岳难，此役成功非幸至，全凭热血障狂澜。”“元戎一怒安天下，兵法心传语至精，惧则常衰谋自固，耻能生勇胜无争，迎春桴鼓全民奋；着力乾坤八表营。从此五洲连奏凯，大同篇好颂升平”^⑦。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喜赋》中写道：“尔度狂澜靖洞庭，又传笳鼓马前听，星沙依旧金汤固，一样丹心照汗青。”“助战雨师夜达明，湖山重洗愈峥嵘，只今涤秽除凶处，湘水长流荡寇名。”“千里长围欲撼难，从头收拾旧河山，但凭救国精忠志，苦斗终能克险艰。”“会当扫荡超东海，笑折樱花一醉歌，大汉雄风依样在，共挥逐日鲁阳戈”^⑧。各种诗文描绘了湖南军民抗敌的英勇场面和精忠报国的无畏精神，更激发了军民强烈的抗敌意识和抗战必胜的信念。

（三）开祝捷大会，激发抗战精神

三次长沙会战胜利，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广大人民踊跃欢欣，“普天同庆，举国若狂，洵一时盛事也”^⑨。上海“自从租界当局限定悬旗日子后，孤岛上已经四、五个月不见国旗了，正当湘北大捷声中，青天白日旗又满街飞舞，激动每一个人的热情，吐出一口窒息已久的长气”^⑩。重庆、衡阳、昆明、贵阳、韶关、宁波、恩施、桂林等共一百多个县市，乃至湖南各乡镇“无不举行湘北胜利庆祝大会参加民众，多者数万，少者数千。或飞电视捷，或宣言讨汪，或举行提灯，或集合演剧。天涯地角，无非胜利之欢呼，水际山头，尽是飞扬之喜气”。各地祝捷大会反映了湖南“通都大邑，僻壤穷乡，咸具同仇敌忾之心，见义勇为之志”^⑪，进一步激发了湖南民众乃至全国民众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救亡情怀。

湖南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组织爱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国共合作抗战、军民团结抗敌，再到对湖南战场军民抗战的宣传，湖南抗战精神得到不断的构建和诠释。湖南抗战精神的构建与诠释，进一步

^⑤①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1940年6月发行，第194页。

^②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1940年6月发行，第195页。

^③陈是训：《湘北大捷与文化事业》，《湖南国民日报》1939年10月19日。

^④陈是训：《湘北大捷与文化事业》，《湖南国民日报》1939年10月19日。

^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1940年6月发行，第405页。

^⑥《湘北大捷》，1942年编印，第103页。

^⑦①罗卓英：《长沙三次大捷》，朱振声：《三捷长沙》，《诗》，长沙忠文书店1942年出版。

^⑧吴逸志：《第三次长沙大捷喜赋》，朱振声：《三捷长沙》，《诗》，长沙忠文书店1942年出版。

^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1940年6月发行，第357页。

^⑩《孤岛的国庆困》，《香港大公报》上海通讯，1939年10月18日。

^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译组编：《长沙会战纪实》，中信书店1940年6月发行，第357-358页。

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坚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必胜信心。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对激发人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